

中、日「中國大陸問題」研討會重要文件

開幕詞

吳俊才

副總統、中村菊男團長、各位貴賓、各位出席大會的中日兩國學者與專家先生：

茲當中日「中國大陸問題」研討會開幕之際，本席謹代表中華民國國際關係研究所和大會籌備委員會，向出席會議的中、日兩國學者，以及光臨大會的貴賓們，敬表歡迎之熱忱。同時也要感謝我們政府的支持；中央日報、中華日報、中國時報、新生報、聯合報的贊助，以及日本方面熱心的朋友們的促成，使得會議能够在短期內順利舉行。

中、日「中國大陸問題」研討會舉行的主旨，在於交換中、日兩國學術界、新聞界研究中共問題的心得，增進相互的了解和認識，從相互切磋之中，謀求雙方更密切的合作。並且希望經由客觀的探討，俾能對中共政權的本質和中國大陸在中共統治下的現況，及其未來發展的趨勢獲致正確的認識和合理的推斷。

談到中共問題研究，中華民國和日本，同具有先天性的優越環境。對我國言，這個問題本身既是國內政治問題的一部份，我們對中共有五十年的鬥爭歷史和經驗，加上語文上的便利，及資料和檔案收藏的豐富，為研究工作者提供了有利條件，經過了二十年的努力，研究工作的開展，已奠定良好基礎，無論研究成果的質量，研究機構的規模以及研究風氣的普及，均有可觀之處。而日本方面在地理上與中國大陸相距密邇，文字上可以兼通，對漢學研究有深厚基礎，以及近年來對中共問題的一向重視，故對於有關的研究，亦頗多特色。本席曾數度訪問日本，看到日本這方面的卓越成就，深為欽佩。自然，由於中、日兩國環境條件的不同，研究的要求，研究的方法和研究的成果也未必盡同。所以，兩國研究工作者多作切磋商榷，尤其是面對面的討論，實屬必要而且是有益的。

中、日兩國對中共問題研究的合作，以至成果交換，最近幾年，漸漸地密切起來了。有許多位日本的研究工作者，訪問過中華民國，由國際關係研究所提供了服務，有的是協調性的工作，有的則直接提供資料或交換意見。而本人以及許多中華民國的研究工作者，也曾經訪問過日本，得到了同樣的協助。這許多活動，或基於雙方合作的契約關係，亦有臨時的邀約，無論出諸何種方式，

都各自表現了誠懇和熱心。在初步合作的基礎上，個人認為，促成中日學者舉行學術研討會，必更利於合作的加強，日方的友人亦有同感。這一主張，今年在國內獲得五大報的贊助，在日本，也得到許多研究工作者的響應。而中華民國政府，對舉行此一會議，更表重視和支持。中日「中國大陸問題」研討會，終能在短期內順利召開。本席對此深感愉快。也確信會議的目的必能達成。

從事中共問題研究，必須掌握兩個要素：一為現象，一為本質。衆所週知，共產學說，強調事物的矛盾，強調質量的互變，中共的黨以及政權，便建立在一個不斷變動的基礎上。看牠的現象，不管組織、人事、政策，無事不在變，無刻不在變。今天的中共，固然與一九四九年不同，並且與一九七〇年也大不相同。不過這些的變化，祇是現象。而牠的本質，階級鬥爭和世界革命，則永遠不變。無論以戰爭為手段，或以和平為手段，均不影響其基本目標。本大會收到中日兩國學者的論文提要，內容包括了有關中共各方面的問題；本席希望出席的中日兩國學者，從變動的現象中，尋求出不變之點；從不變的本質中，研究牠變化的趨向，藉以了解中國大陸當前發生的許多事件的真相，和獲致正確的結論。

各位貴賓，各位學者，專家先生，中日兩國文化學術界的往來，最早可遠溯中國的隋、唐朝代，逮乎明末朱舜水先生的旅日和昌明陽明學說，清末中國知識份子的大批留日，其關係的密切，可謂代不絕書。茲當中共為禍世界日益猖狂之際，日本的友人們遠道光臨，與吾人聚首討論共同關心的問題，深使吾人感動。

本次大會，因為籌備時間過於短促，程序擬定亦太緊湊，其不週與增添辛勞之處必多，至祈出席的學者先生們多予原諒，並請光臨大會的貴賓們多予指教。最後，再向諸君致謝，並祝大會成功，各位健康愉快。

嚴副總統開幕致詞

主席、各位貴賓、各位女士、各位先生：

今天中、日「中國大陸問題」研討會在此間開幕，家淦承邀致辭，深感榮幸。特代表中華民國政府和人民，向出席的中、日兩國學者、專家致誠摯歡迎之意，並預祝大會成功。

衆所週知，所謂「中國大陸問題」，是指對於當前統治中國大陸的中共政權和毛澤東集團的一切，作學術研究的命名，也可稱之為「中共問題」。我們回顧，自民國十年（一九二一年），共產主義這種政治上的虎烈拉被引入中國以後，不但導致了中國今日的悲劇，更為當前的亞洲以至整個世界帶來無窮的禍患。此一問題的複雜性，使許多的政治家感到棘手，而有賴於學術上的研究剖析，來提供作為解決之道的參考。個人所以拿虎烈拉來比喻共產主義，實因為兩者有相似之處，也就是同具傳染力強、危險性高，但祇要預防和醫治得宜並非不治之症的特性。這個特性是值得給所有正患「恐共症」者一提而加以認識的。中華民國學術界和專門研究機構，對「中共問題」的研究，自民國三十八年（一九四九年）以後，基於對敵鬥爭的實際需要，從事作學術的深入探討，已經有了顯著的成績。日本方面，對中共問題的研究，夙以平實、細密見稱於世。家淦對日本學術界的卓越成就，深表欽佩。今日兩

國學人能有機會共聚一堂，就「中共問題」作學術上的討論，必能集思廣益，剖析疑難，闡發精微，來互補短長。個人甚願各位的遠識蓋思，為世界的政治領導人物，提供寶貴的卓見。

各位貴賓：中日兩國學術界的密切來往，早已史不絕書。兩國的知識份子，也同有以天下興亡、人類禍福為己任的胸襟。吾人默察時勢，所謂「中國大陸問題」演變至今日，在時間上已延長達半世紀，在空間上已由中國本身影響到全世界，但世人對牠的了解，還有許多人是懵然無知，或知之不够真切，也有誤知而執迷不悟的。這種對中共無知或誤知的後果，造成瀾漫的姑息氣氛而自貽伊戚。對此等情況，中華民國政府願將本身所承受的痛苦經驗，公諸於世，我中、日兩國學術界對此，當亦不忍坐視。家淦以為研究「中共問題」，以下三項問題務必求得真確答案，始能對中共無知或誤知者有所助益：其一，為中共與中國文化有無淵源問題；其二，中共偽政權的穩定性問題；其三，中共對外政策問題。我們以為，中共的一切所作所為絕然違反中國文化傳統，中共偽政權以殘暴為統治手段絕難穩固，中共也絕不會放棄赤化和毒化世界的策略。相信大會必能對此作深入探討，獲得結論。

各位貴賓：大家都可看出，整個世界在今年一年內所發生的急劇變化，無疑這些變化的影響多是來自中國大陸的中共，也無疑的以中華民國和日本所受影響最大，吾人自不能不寄予嚴重的關切。中、日兩國，不止是親密鄰邦，也同對東亞以至世界和平負有重責。因之，吾人把本國的前途和鄰國的安危同等重視。中國人的處鄰原則，承平之時是守望相助，憂患相臨則善進忠言。家淦願以諍友之誼，奉勸日本的政治領袖們，對目前的小利和長遠的福祉慎作衡量，提高對中共的警惕；更希望日本學術界明智之士，在此一問題上，作為暮鼓晨鐘，為朝野發生喚醒作用。至我中華民國本身，目前雖遭遇到一些挫折，但吾人既不怨尤，亦不氣餒。吾人建國六十年的歷程，備遭險阻，無不一一克服，化險為夷。今日的憂勞相加，正好激發吾人前進的潛力，更加堅定復國建國的信心。個人深信，舉國上下在敬愛領袖 蔣總統領導之下，必能莊敬自強，衝破難關，為自己打開更康莊的道路；終必完成光復大陸、消弭共禍的偉大目標。當前我們自然需要朋友們的支援，但了解和同情，更使我們增加勇氣。

各位貴賓：家淦今天能以地主國行政首長身份與會，為朋友們一盡由衷之言，無任快慰，更望各位學者的高論，能使我們斟酌損益，裨補闕漏，尤為欣幸，特在此再為致意。同時，還希望遠道惠臨的日本嘉賓，在會議之餘，對敝國的種切，多加觀察，不吝指教。

謝謝各位。

中村菊男先生致詞

此次承國際關係研究所吳所長俊才先生之邀請，我們一行三十人，前來中華民國訪問並出席「中國大陸問題」研討會，對吳所長以及各位先生的盛情，衷心至為感激，謹此敬致謝忱。同時對在東京方面惠賜奔走幹旋的張棟材先生，亦表謝意。

此次前來訪問之一行人士，均係大學教授、研究院研究員、評論家以及國際問題或中共問題之專家，為日本指導階層之有力人

士，也是各個部門已有成就和年青一代的專家，可說是一種多彩多姿的編配，希望能在此次之研究會席間，和中華民國方面優秀的專家們，交換意見，獲得豐碩成果。

日本人中，大多是初次訪問國際關係研究所，但本人在今年十月 貴國雙十國慶之時，承吳所長陪同曾參觀國際關係研究所，當時目觀所內設備完善，資料豐富，內心至感欣佩，尤承研究所各位先生之熱烈歡迎，隆意盛情，使我永留腦海，終生不能忘懷。

此次欣然出席中、日「中國大陸問題」研討會，亦可說為酬謝研究所各位先生月前所賜之盛情而來。

綜觀國際政治大勢，今年發生顯著變化，謂美國尼克森總統的發表訪問中共與中華民國的退出聯合國，更是值得重視。

尼克森總統雖已決定明年二月訪問北平，但其結果如何，目前尚無法測知。季辛吉特使曾二度訪問北平，其內容亦無法獲得；但尼克森總統欲與北平政權之間，開拓一次交談之機會，藉以求得某種諒解，確屬事實。此外，另一目的即為對蘇聯問題，美國似欲聯合北平共同對付蘇聯。

此項美國對北平與台北，同時加以玩弄之雙元外交，對機會主義國家影響甚大，致使提出聯合國之反重要事項案遭受否決，而阿爾巴尼亞案獲得通過，中共之進入聯合國，雖說係屬大勢所趨，但北平政權不會遵守聯合國憲章，過去中共的言行，亦不能符合聯合國維持和平之精神，韓戰當時，中共被聯合國判定為「侵略者」之決議，迄未取銷。

聯大使中共無條件進入聯合國，而將忠於聯合國憲章精神、對聯合國之發展，有重大貢獻之中華民國排除在外，從國際信義來說，是一件不能容許之事。

我們目觀此種事實，認為聯合國在本質上，已與過去不同，所謂聯合國之變質，即係指此而言。聯合國今後能否發揮維持世界和平之機能，已是極大疑問。

縱使中華民國已退出聯合國，深信貴國仍將一本其獨自之立場，應付今後之國際情勢，中華民國過去為聯合國之發展所貢獻之功績，亦將永垂青史，不會為世人所忘。

今秋以來，情報顯示中國大陸確已發生突變事件，而且是一項最高幹部間之權力鬥爭，並與毛澤東繼承者之鬥爭有關，透過文化大革命握得實權的林彪勢力已見衰落，周恩來發言權，日漸增大，軍隊內部亦有權力之爭，而且未來尚有不可想像的事實發生。

此項權力鬥爭，可以判斷與尼克森之往訪問題有關，過去北平政權，屢屢攻擊美國是『美帝國主義』，而這次一變邀請美國總統前去訪問，足見其中定有極大矛盾。因此，可以充分預料對此必將發生反動，且已獲得佐證。相信各位先生在此次研究會上，就此問題必有詳盡意見發表。

本人認為不僅對於上述中共之表面現象有研究必要，對中國大陸基本問題，中日雙方人士，如能坦率交換意見，則至感幸甚。提出此種願望，乃係有鑑世界上多數人僅自大陸的表面現象，觀察中共之行動，這是一種膚淺的看法，如果不從其內部之基本事物，予以深入分析，則無法獲知其真實情形。從此觀點來說，希望我們相互研究，必須就其本質作深入而敏銳的分析。

此次研究會係就中共（一）黨政及社會；（二）內部鬥爭、人事及思想；（三）對外關係；（四）軍事；（五）財政及經濟；（六）文教等等各方面的問題，由中日雙方人士相互交換意見，希望能坦直檢討，俾對世界發生啓蒙效果，同時對中日兩國之輿論指導，亦能導致深刻影響。

最後對中華民國各位先生之盛情，深致謝意並祝各位健康愉快，前程無量。

閉幕詞

吳俊才

各位貴賓：

中、日「中國大陸問題」研討會自十二月廿日開幕，一切按照預定程序進行，到今天已經圓滿結束，茲當閉幕之際，本席首對各位學者專家五天來的辛勞、各方的支持、新聞界的合作以及大會工作同仁的熱心服務，表示敬佩和感謝。這次會議，不獨對中日兩國共同關心的問題——中國大陸問題，進行了廣泛的、深入的討論，也由於兩國的學者的接觸，加深了彼此的認識和了解，為今後更進一步的合作，開闢了坦途，並且對中日兩國學術界如何共同攜手反共的問題，提供了寶貴的意見，這些收穫，是極其宏偉的。

大會曾經聽取了中、日兩國有關「中國大陸問題」研究工作現況的報告，中國大陸當前情況的報告，中國大陸社會心理狀況的報告，和錢穆先生所作有關中國文化的學術講演，也參觀了中華民國所藏的有關對敵鬥爭、中共禍國及其對外侵略等史料之展覽。這些報告和展覽對加深彼此的認識和了解，均屬必需和極其有益的。至於論文的討論，所涵蓋的範圍，包括了中共當前的許多重要問題。在四天的分組討論中，中、日兩國的學者，熱烈地對這些問題作了客觀的探討，所見雖未必盡同，而正好從不同的見解中，汲取了寶貴的教益。個人認為，這些研究都是平實的、中肯的，不止在學術上是一項收穫，也為兩國的政治領袖，提供了豐碩的參考資料。

同時，吾人從討論當中，對中共的真相，得到幾點共同認識：其一、共產思想既非出自中國文化，其暴戾偏激更不能為大多數中國人民所接受。所以中共偽政權，雖以暴力控制了中國大陸，但他們絕不能代表中國人民。這一股邪惡逆流，將在浩大的中華文化的歷史洪流中迅即消失。其二、由於中共的本質，以矛盾、鬥爭及「不斷革命論」的邪說為基礎，既以全中國人民為鬥爭的對象，亦以本身為對象，故其所謂「敵我矛盾」、「人民內部矛盾」，決不會消失，內部的鬥爭亦也不會停止；因此，建築在此一動搖的基礎上的政權，決不是穩固的。其三、中共當前的對外策略，雖然扮演了和平的姿態，侈言和平的口號，但也曾公開聲言，他的對外政策並無改變，此即反帝、反修、反全世界反動派之世界革命的大戰略不變。故吾人可以確認，中共無論以暴力或「和平」為手段，他的對外侵略和擴張是決不會改變的。

各位貴賓：五十年來，我中國深受共黨荼毒之慘，正應合中國：「三折肱，為良醫」的古訓，對中共知之最深最切；本人也深

信，日本的朋友們，由於長期來的深刻研究，其了解當不下於吾人。本人希望能在這種情況和本次會議的基石上，使中日兩國對「中國大陸問題」研究的合作更進一步，期能對中、日兩國的前途有所貢獻。

各位貴賓：五天來中日兩國學人，在此集會，對共同關心的問題，各抒所見，不獨是智慧的交融，也屬精神的契合，個人相信大家是愉快的。唯一的缺陷是會議籌備過於倉促，不週之處難免，要請與會諸君尤其是日本友人，多加原諒，驪歌已起，分攜在即，本人謹此向各位道別和再致謝意，並祝 各位旅途平安，新年快樂。

中華民國對「大陸問題」之研究

郭華倫

當吾人報告中華民國對於「大陸問題」之研究時，不能不注意到今天我們舉行的會議是學術性會議，這一會議是以學術觀點來研析中國「大陸問題」。從這一立場出發，環顧國外若干學者，其對「大陸問題」之研究，已為國際姑息逆流所左右，亦為現實政治所運用，喪失冷靜客觀態度，因而往往違反客觀事實及其發展規律，甚至流於主觀武斷。其主要論點認為：毛共之竊據大陸，有如中國歷史上之改朝換代；毛澤東思想為中國文化的傳統；毛共在大陸的統治，經過「文革」大混亂之後，已趨於穩定；讓毛共進入國際社會組織，可以約束其行動，使之在國際上担任建設性角色；現在是談判時代，與毛共談判，足以解決國際糾紛；大陸人眾土廣，與之貿易或建交，有廣大市場，大可獲利等等。

就上列論點而言，顯然係以一般尺度從表面上去觀察大陸問題，並為某種需要而得出的結論，忽略了共產黨的本質，不瞭解毛共竊據大陸後，社會結構之變化及其長遠戰略目標，而為若干表象所迷惑與蒙蔽。對此，特先論析如左：

一、中國歷史上之改朝換代，是在同一社會制度下之一種變革與演進，由農業社會之改朝換代，轉向工業社會之民主憲政的發展，其社會之基本結構及私有制度與人權自由，並無根本變更；但毛共竊據大陸，已不是單純的改朝換代，而是徹底破壞原有社會制度與結構，以集體所有或全民所有制名義，壟斷與沒收所有生產工具和生產資料，既消滅了所謂地主、富農、資本家，又把工人、農民束縛在工廠、公社制度下成為奴工、農奴，同時以下放勞改為名，磨折與消滅知識份子，形成以共黨為骨幹、以軍隊為基礎的專制獨裁統治，此與中國歷史上之改朝換代是截然不同的。

二、所謂毛澤東思想，照毛澤東自己的說法，就是「馬克斯主義的中國化」，也就是「依據馬克斯列寧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正確地解釋歷史中和革命中所發生的實際問題」。不過，毛澤東所強調的是馬克斯、列寧、史大林的階級鬥爭、暴力革命、無產階級專政的傳統，他所接受的，是已經失敗的馬克斯時代的巴黎公社，列寧當年的軍事共產主義，以及史大林時期的農業公社；所謂以世界農村包圍世界城市，類似當年列寧、史大林在西歐革命失敗後所強調的由東方迂迴西方的戰略方針；所謂繼續革命論，也不過是托洛茨基不斷革命論的衣鉢和變稱；毛澤東的戰爭萬能論與暴力革命的輸出，不僅是馬列主義的傳統，而且發展為贗武好戰的社會軍國主義。類此所謂毛澤東思想，顯然與中國以仁愛為中心，以倫理、民主、科學為精髓的文化傳統是互不相容的；「文

革」期間，毛共叫罵「破四舊、立四新」，就是企圖摧毀中國傳統文化，改變「整個社會的精神面貌」。當然，毛澤東是中國人，自然受到中國文化的影響，不過，他一貫反對中國正統文化，反對尊孔讀經，他愛讀的是三國演義、水滸傳以及歷代流寇叛亂的軍事傳奇小說，把流寇竄擾稱作農民起義或農民戰爭，而且加以研究批判和仿效，因此，毛澤東思想取之於中國的，僅僅是歷史傳統的黑暗面，據此而視作中國文化傳統，如非無知，便是有意的歪曲。

三、一九六九年四月，毛共召開「九大」之後，大陸局勢，已從「文革」大混亂中逐漸趨向緩和，並在國際上展開笑臉外交，若干國外人士便以為大陸政權已趨於穩定；其實，照毛共的說法，「文革」並未結束，而是進入所謂「鬥批改」階段。而且毛澤東的「繼續革命論」，對內是長期的批判鬥爭、勞改洗腦，無盡期的權力爭奪和派系傾軋；對外則是不斷的暴力革命輸出和滲透顛覆的活動，直到赤化全球為止；目前則是軍權惡性膨脹，割據局面逐漸形成，槍、黨關係爭執，軍幹羣、老中青內鬥，人代會、偽政權之權力爭奪，對外策略轉變的影響，凡此種種，均將使大陸政權永遠無法穩定。今（一九七一）年九月的變故，使林彪系統失勢，軍機逃亡墜毀，人代會延期召開等亂象暴露，正是大陸新變亂的開始。所謂大陸統治的穩定，已為事實所否定。

四、毛共竊據大陸以來，曾經派兵侵略南韓，攻擊印度，直接支援東南半島戰爭，武裝巴勒斯坦游擊隊，發動非洲若干國家政變，煽動中南美各國進行反美鬥爭，挑撥美國種族糾紛，咒罵日本天皇為僵屍，支援日本學潮工潮，攻訐聯合國為超級大國工具，聲言另組革命的聯合國；同時在世界各國組織親毛共黨，發動階級鬥爭，民族戰爭，號召小國起來打敗大國；前年「九大」，更在黨章中規定其「三反」路線與赤化全球戰略。似此以埋葬「美帝」和所有民主國家為職志的毛共，安能妄想其在國際社會中扮演建性角色？今年毛共闖入聯合國後之囂張跋扈，更證明了這一論點的破產。

五、民主國家間的糾紛，以談判尋求解決，原是一種正當與可行的途徑，但對於共黨國家，尤其對於毛共則大謬不然。毛共把談判當作戰爭的另一手段，當他準備未周，力量不足時可以接受談判，但當他足以擊倒對方時，就會把談判一脚踢開；當談判對他有利時，接受談判，反之則與之決裂並誣過於對方。毛共曾一再聲言，決不以原則做交易，談判與否都是「針鋒相對」。中日戰爭期間，國民政府與中共的七次談判，尤其重慶會談，就是最好的教訓；長期的華沙談判以及巴黎和談，又是最近的例證。今日尚有人夢想與毛共談判，解決爭端，無異是與虎謀皮，其失敗殆可斷言。

六、大陸經濟，經過「文革」大破壞後，在其恢復過程中，轉而以備戰為中心，因而其資材大都用於發展核武器、備戰、「援外」及支持各地的「解放戰爭」。在民窮財盡的逼迫下，遂不能不發動「工業學大慶」、「農業學大寨」運動，強調自力更生、自給自足、備戰備荒，進一步剝削人民，加以軍人的控制與干預，打擊生產情緒和效率，影響工農業的恢復和發展。另從貿易方面研究，一九七〇年，大陸貿易總值不過是四十二億美元，以人口計算，每人每年平均貿易額不到美金六元，為亞洲其他低度開發國家最低者，足見在毛共暴政壓榨下，人民的購買力是何等的薄弱。近年毛共且強調發展小型地方工業，調整工業的作戰佈局，其設備器材，均以自製為原則，進口物資限於備戰備荒之需要，出口產品則以農礦等物為主（至於鴉片海洛因的輸出係取偷運方式）。在這一情勢下，民主國家與毛共貿易，除了裝備他的核子牙、壯大他的戰備，準備將來屠殺我們自己和我們的子孫、尚有利可言外，其

他究有多大利益可圖，實在令人懷疑。

以上所說，雖係針對若干姑息論點而言，但亦為吾人對「大陸問題」研究重點之一。緣因中華民國對於「大陸問題」之研究，一向極為重視，政府機關基於政治作戰需要，自有其分門別類之研究外，民間學術性的研究，目前是以中華民國國際關係研究所為中心，其他研究機構，諸如國立政治大學的東亞研究所、中央研究院的中美人文社會科學合作委員會、中共研究社、中國大陸問題研究所、政治作戰學校的政治研究所、黨史編纂委員會、以及蒼廬資料研究中心等，也不斷從事於大陸問題之研究。這種學術性的研究，近年來的情况，可概述如次：

一、關於研究資料方面：中華民國公私立研究機構，對於有關「大陸問題」之資料的蒐集、整理和運用，早已重視，尤其中共竊據大陸以前之共黨歷史資料，蒐存最為豐富，且大都為原始文件，彌足珍貴。這些資料，主要的收藏於蒼廬，石廬室和黨史會，單以蒼廬資料研究中心言，即存有三十萬件以上；石廬室資料，已由胡佛研究所製成膠卷，供各國研究機構參考；至於黨史會資料，大都為一九二二年至一九二七年間，有關國共關係之原始文件。中共竊據大陸以後之動態資料，亦有充分的蒐集與收藏，其中有許多亦為原始文件與實物，為一般機構所不易取得者，如遠及中共將參加韓戰之報導，連江文件之收集，登陸艇文件之編整，近如前年中共「九大」黨章之提前獲得，去年偽憲法草案之取得與公佈，在在都說明動態資料蒐集的及時與效用。這些動態資料，分別保存於中共研究社、大陸問題研究所及國際關係研究所。訪問資料方面，除前後投奔自由之反共義士可以訪問蒐集外，關於已往國共兩黨關係，台灣許多資深人士之回憶，足可提供珍貴的研究資料，另有許多人士，還可提供其親身體驗之資料。當然，我們除積極蒐集資料以供研究外，也分別與國外研究機構從事資料的交換運用與研究成果之互相參證，以補吾人之不足。對於這些資料之交流運用，編有聯合目錄，國內方面，自可隨時參閱研究，國外學人亦可經國際關係研究所之介紹，至各單位使用資料。大陸「文革」以來，國外學者、專家、研究生，乃至記者編輯訪問中華民國蒐集資料撰寫論文專書者日眾，約略統計已逾千人，我們都曾給予各種方便與協助。國際關係研究所深願溝通國內外學人之研究，成為研究資料供應中心，以推動研究之深入和發展。在此尚須一提者，近年來，各國記者和專家，在訪問大陸後再來台灣者亦不乏其人，其在大陸實地訪問觀察所獲之資料，固不無參考價值，但其參觀訪問所在，幾全為毛共特定之地區，特定之樣板，易為某種假象所惑，而產生以假亂真或以偏概全之錯覺，因此，吾人對此類資料雖不輕予忽視，然必多方印證和深入分析後始予採信和引用，以求慎重和客觀。

二、關於研究人員方面：各研究單位均感研究人員之不足，這裏關連到如何使現有人員素養提高且能安心工作，如何培養新進人員，及鼓勵更多的學者專家參加大陸問題研究諸種問題。在這一方面，各研究單位尤其國際關係研究所曾作多方努力；在改善研究環境方面，已在幽靜的木柵山區建築研究大樓及圖書館，使研究人員能靜心研究。人材之羅致與培養方面，曾不斷延聘國內各大學教授專家以及學成歸國的留學生參加研究工作，年來延聘學者專家已逾百人；另與政治大學合辦東亞研究所，培養研究人員，刻有五個班次，約六十人，第一、二期畢業生，授予碩士學位後，已參加實際研究工作，表現良好；同時與胡佛研究所、聖約望大學亞洲研究中心、南加羅林那大學政治研究所、高麗大學亞細亞研究所、日本世界政經會、西柏林自由大學等單位交換研究人員與研

究生，從各方面來充實與提高研究人員素質。他如政治作戰學校的政治研究所、中共研究社、中國大陸問題研究所、蒼廬資料研究中心等單位均着力於人材之吸收訓練與培養，以加強陣容，擴大研究。至於培養研究人材所取方針，在使新進人員對於中國傳統文化有深刻認識，對於國際局勢與世界思潮有正確瞭解，同時要有馬列主義的基本知識，以適應大陸問題之研究。今後如何鼓勵我國學者專家及各學術機關，重視大陸問題之研究，並與國外學人共同作盡善之努力，仍有待各方的合作與推進，此亦為此次中日「大陸問題」研討會所共同企望者。

三、關於研究方法方面：對於研究「大陸問題」之態度與方法，除一般所採用的演繹法、歸納法、比較法、或有時採用的歷史法外，吾人特別注意者有二：一為摒除反共的主觀成見，即不把反共的熱情滲入到大陸問題的研究與論斷之中，使研究冷靜客觀，符合大陸情勢的發展。二為避免採取在自由世界中若干人所使用的某些標準與尺度來衡量大陸情勢及其所作所為，免為中共之表面宣傳與虛偽手法所愚弄。為此，吾人亦參照辯證邏輯來分析大陸問題，諸如以矛盾論尤其一分為二的方法來研析毛共內部鬥爭與人事浮沉，以不斷革命觀點論斷中共之鬥改，一打三反運動、思想路線教育、槍黨關係及其統治之無法穩定緣由，同時亦以其統戰觀點及其兩面手法研析毛共之和平共處與外交活動，以揭露其顛覆陰謀及其埋葬所有民主國家之最終目的。如從研究方式言，除個人研究外，亦注重集體研究和集體創作，國際關係研究所曾不斷約集各方學者專家舉行學術座談會，以收集思廣益之效。當國外學者專家造訪時，亦常常採用座談方式，交換意見。吾人出版之中共人名錄、中共術語彙解等，即為集體創作的產品。在研究工作分工方面，如果說對於集體研究與綜合研究方面曾有若干成就，掌握了大陸情勢的變化與動向，那末，在分工方面，由於人力之單薄，參加研究的單位不够寬廣，因而未能對大陸的每一問題作細密的分工和透澈的研究，仍有待吾人之規劃與努力。有人或以為吾人地處大陸前線，與毛共立於敵對地位，對大陸問題之研究，難免感染主觀或武斷，此為一種機械的猜測或因尺度不同的看法所使然，其實，作為一種學術性之研究，一開始即須力避此一偏向的發生，務求冷靜客觀，尋求事實真相，以期有所貢獻於國家民族及自由民主世界各國也。

四、關於研究成果方面：如果說，中華民國各研究機構，近年來的工作已有若干成就，那末，這種成就除依靠各單位之努力以及相互間之協調合作外，還得力於國外研究機構與學者專家的合作和支援。這種成果，主要者約有數端……

(一)出版中外文刊物，報導大陸動態，並加以研析論斷。在此期間，編纂與發行英文月刊（ISSUES & STUDIES）八卷三期，日文月刊（問題與研究）四期，匪情月報十四卷十期，中共研究五卷十二期，匪情研究十四卷十一期，匪情述評一六四輯，國際共黨問題每月一期，問題與研究十一卷三期，東亞季刊三卷二期，中共動態分析一〇〇期，中國大陸研究十九期，匪俄動態摘報八期。其他尚有對內參考研究的各種期刊或專門性的刊物等等，以輔助一般研究之不足。

(二)編纂研究大陸問題之用書與基本資料。其中較具特點者計有：蘇俄簡明百科全書、中共人名錄（中、英文）、中共術語彙解、匪俄爭執原始資料彙編（一—十四卷）、共匪禍國史料彙編（一—四冊）、共產黨原始資料選輯（三冊）、共匪首要事略彙編、劉少奇問題資料選集，中共年鑑（一九六七—一九七一年）、匪黨中央新當權派、匪偽政權新人事、匪軍新人事、圖書資料聯合

目錄四冊)等等，以供研究人員使用。

(三)整編大陸問題之動態資料與文件。其中較具特色者，計有連江文件、登陸艇文件、「文革」重要文件彙編、中共「九大」專輯、共匪偽憲法暨其他共產國家憲法資料彙編等，以供研析大陸情勢之用。

(四)出版研究專書，其中較為突出者計有：中共史稿(三冊)、中共史論(四冊、中、英文)、中共興亡史(兩冊)、鮑羅廷與武漢政權、容共與清黨(兩冊)、江西蘇維埃之建立與崩潰、五次圍剿戰史、毛澤東思想批判、毛澤東語錄批判、毛澤東軍事思想研究、歷史寫下了答案、蘇俄及其附庸、中共的土地鬥爭、中共棉紡織工業、中共對外貿易的研究、中共的文藝整風、中共文字改革與漢字前途、中共文化大革命與紅衛兵、野坂參三與毛共(中、英對照)、周恩來(英、日文)、德欽丹吞之末日、第一屆中美「大陸問題研討會」專輯(中、英文)等等。這些專書，對於中共歷史、毛共文化思想及其政策與人事各方面，提供了可貴的資料及客觀的研析論斷。

當然，上列若干成就，遠不及客觀需要；檢討起來，我們的研究工作，有待加強與改進者甚多，諸如發揚分工合作的功效，加強對中共科學技術的研究，充分使用現有資料，蒐集與整理訪問資料，密切與國外研究機構之合作交換，提高研究素質與水準，擴大研究範圍和資料供應等等，在在都要求吾人作盡善的努力，同時也希望在座的學者專家隨時指教並予支援。

謝謝各位！

日本對中國大陸問題之研究概況

桑原壽二

一、首先謹向中華民國方面的各位代表，以及在座的諸位先進、諸位先生深致崇高的敬意。

二、「日本對於中共之研究」，是吳所長給我的報告題目，吳所長不把它稱之為「中國之內之中共」，而限於狹義的『中共』二字，恐係鑑於以中共問題為核心的日本輿論，已趨於分裂，出現混亂狀態而懷有一種憂慮與關心的心情所致。因此，我想給我這一問題之重點，在報告混亂局勢中，日本對中共的研究狀況如何，其方向及影響力又如何等等方面。

三、與日本輿論分裂情形一樣，日本研究中共問題的人士，對於「中共問題」之觀點，亦同樣陷於四分五裂的混亂狀態。持有正確見解人士的意見，未必能對政策決定者發生影響，這是當前日本的實況，如所週知，對於日本決策人士可能發生影響的是大眾傳播的論調。但此種論調，並不健全。我向各位先生報告此種事實，內心至感遺憾，然而事實究為事實，應該坦率承認，基於此種認識，作最大的努力，方為最上之策。

四、然而此種現象，只是事實的一面，貴國人士，恐不易看出的另一面那是日本所有的潛在力量，仍極健全。例如，當初以一百位知識份子為構成目標而開始創立的『中國問題百人委員會』，雖然沒有從事積極勸誘工作，但在短期間內，竟然增到五百人之多，甚至在一兩個地方，建立起分會組織。這次中日中國大陸問題研討會，也是同樣，最初本人與中村團長私下研究，估計不過十

餘人參加，雖然未經任何努力，結果參加人數，已遠超過了預定的人數。此一事實，充分證明日本的潛在力量和健全性，絕無疑問。五、對於這種潛在力量，即「沉默的多數」請惠予注意。本人相信如假以若干歷史的時間，當可證明何者為正確。這是我們對此項課題的基本見解與答案，所以先在此提出說明。

六、剛才說過，希望假以若干歷史的時間一語，旨在說明當前日本報界論調及部份知識份子，對於中共問題的態度與看法，有其根本錯誤與缺點。從結論上來說，因為此等人士之接近中共，不是站在『中國歷史』的觀點上，亦非站在『中國真理』的觀點上，及缺乏對『中國文化』的評價與判別所致。一言以蔽之，『中國之中的中共』——就是中華民族與毛澤東政權必須分開討論，這個最根本而又最重要的想法他們竟然忽略了。因此我們希望把問題關鍵放在這個立場上。

七、日本方面部份親中共學者及部份知識份子，對中共印象，幾乎沒有例外的，都是第一以魯迅文學作品所過濾出來之中國；第二以美國施諾所著『中國的紅星』所描述對於中國共產黨的印象；第三以費正清教授一派所寫的對漢學之單方面的了解等為基礎而形成的。當然，這些作品是敘述中國之一部或中國共產黨的一個側面，本人亦不能否認對此類作品有一種感動與求知的滿足感。八、但這些作品，無疑都是以某種一定之思想立場和政治目的為基礎，所描述出來的理想化的中共幻像。如果他們把這些描述相信它是中國的實態或真的中國，認為是中共真正之姿態，那便造成了無可補救的缺陷。今天日本所謂進步的文化人，就是拿一點當全體，或者把理想化中共幻像觀念來了解中共。因此他們的立論，是立足於一種虛構的基礎之上。

九、換言之，此等人士，沒有把研究中國與中華民族作為正確認識今日毛澤東政權所不可缺之先決條件，這是部份日本知識份子，在研究中共問題上發生偏差的原因，也可以說這是他們研究中共問題的最虛弱之處。

十、基於以上的假定，茲再補充一些淺見。

十一、毛澤東所擬嘗試與妄想的，即是中國之共產化與赤化世界的政策，自不待贅述，因此，以馬克斯主義的學說與理論為基礎來觀察中共是絕對必要的。同時，基於西歐合理主義之觀點，從事研究分析，亦為不可或缺之要件。但為正確認識中共，僅憑這些仍感不足，吾人之困難與問題之真正癥結點，亦就在此。

十二、換言之，以馬克斯主義或西歐合理主義之觀點，從事觀察和分析中共情況，雖為必需之條件，但決非全部的條件，因為中共畢竟是存在於中國之中的緣故。此點對我們身在「中國之外的人」來說，有其特殊之困難性，在中國人們看來，不成問題的問題，在我們面前却成為一項特殊問題，成了極大障礙。

十三、問題極其簡單，因為毛澤東革命之舞台是在中國，控制的對象，亦是中華民族，這是一項極其平凡的事實，但對我們來說，却是一項大問題，而且非把它當做大問題來加以考慮不可。中國人們可以不必體認的問題，我們却須極力加以體認，正因為上面所說是平凡的事實，所以反使日本的許多學者，容易予以忽略。同時就在此種平凡事實之中，存有問題的真正困難，我們必須把起跑線劃在這裏。不過我們不論如何去跑，和諸位先生相比，將和在賽跑中背負障礙物一樣而無法縮短距離。但是如不以此作為立

足點，那將永久不能把握住中共的立體情況——即對於中共的真相及其將來的命運將永遠無法預料。

十四、諸位先生對於包括日本在內，外國人士的對中共看法必有無可挽救的庸淺之感，而不禁嗤之以鼻。此種現象的造成，係由於余適間所指對於平凡事實之研究缺乏努力所致。易言之，對中共問題，只從表面現象來解釋，而不作深入之探討。我必須再度強調，對諸位先生認為當然而不需意識的問題，我們却必須強烈地加以體會，如不作如此努力，則對當今毛澤東政權究竟處於何種政治環境，當前面臨何種問題等等，不可能探究中共的實態。當然，對中共政權的命運，亦幾乎無法予以預測，此均不待贅言。

十五、當然，除中國以外，日本對「漢學」的研究，可稱霸世界，研究經驗之累積，亦極豐富。也就是說真正瞭解中國的國家，恐怕祇有日本一國而已。日本於戰後，對「漢學」雖稍荒廢，但仍有不少人才，認真從事此項研究工作。不過這些人對於中共不太發生興趣與關心，同時，研究中共問題的學者，如上所述，對此方面之探求缺乏努力。換言之，漢學與今天之中共研究未能形成一體，雖有豐富經驗的累積，而未予以充分利用。日本雖被認為世界上最瞭解中國最深的國家，實則不然。日本對中國研究雖有成就但在對中共研究工作上，却非常脆弱。

十六、例如中共現正遵循馬克斯主義的教條，高喊阻止資本主義復辟和強調階級鬥爭。誠如上述，此種情形確已正在萌芽，但彼等所謂之階級對立，是否可以僅僅限定於此，而加以解釋？此外，毛澤東革命的真正障礙，乃是中國歷史及被中國歷史鍛鍊而成的中國文化，或經幾千年的歷史考驗出來的中國社會制度。彼等所謂階級鬥爭的真正內容，是否就在此處？

十七、如果讓我們天真地，以我們一般常識範疇，來解釋所謂階級對立或階級鬥爭，則對當前毛澤東政權及其將來命運如何，恐將無法提出正確的判斷。

十八、雖曾接受「人民公社」、「文化革命」的激烈考驗，但在農村報告之中，仍然不斷有「想變天」、「變天賬」或「只有階級親、沒有宗族親」等項辭句，這裏所隱藏深刻的『中國之意義』，彼等始終不會瞭解。當然，彼等亦不明白這些言詞所象徵著的「中國之抵抗」，同時彼等亦不願謀求理解，此乃是今天日本部份中共問題研究者之實態。

十九、現在必須舉出另一妨礙瞭解中共的重要原因，誠感遺憾，此即彼等對中國知識份子獨特之反抗精神及社會地位與作用，毫無認識。如僅以西洋知識階級概念來研究中國智識階級，恐將不可能瞭解中共之真相。雖然在諸位先生面前，已無說明必要，但必須強調，包括日本在內，外國人士瞭解中共的陷穽及弱點，即在於此。為何毛澤東對知識份子燃起憎惡之念？為何毛澤東必須對歷史及傳統發布廢棄宣言？為何毛澤東必須強迫實行愚民政治？為何毛澤東必須發動文化革命？有關這些問題，如果彼等對中國之知識份子無所瞭解，則絕對無法提出答案。日本雖被譽為世界上最瞭解中共的國家，但部份知識份子及新聞界人士，却與其他各國持有同樣之弱點，此點必須予以指出，實不無遺憾之處。

二十、彼等對一篇雖然以毛澤東思想武裝起來文章，但在結論中却說『若祇賴毛語錄，則只能造成片面的殘廢人。』彼等對此論文的真正意思、目的以及其嚴重性，絕對無法瞭解。（紅旗第九期『出版更多的普遍性讀物』一文）。最近大陸上突然出現的「英雄否定論」、「特殊天才否定論」、「先知先覺否定論」等，論文的政治性意義，或「毛政權內部發生些什麼？」等等問題，都

不能予以洞察。這些論文的字裏行間所滲雜之「真命天子」、「皇帝」、「偉人」、「皇冠」等用語，究是對誰諷刺，彼等亦未加予懷疑。彼等不瞭解中國知識份子及文人的反抗精神，當然對於祕藏於其間的「對時代的嗟怨」、「民族之呢詛」等亦不可能加以體會。至於對中共的真實情況及將來動向，那將絕對無法了解。

二十一、最後，日本部份學者認為毛澤東的發動文化革命，乃是馬克斯主義革命發展中必經過程，甚至有某些評論家，幻想般的將比喻為「出埃及」而加以描述。但彼等對於毛澤東為何被迫走上武力政治之途徑及使其如此作法的背景為何？以及採用武力政治的歷代王朝終必走向何種運命等問題，均未加深究。彼等對於中華民國的歷史意義與使命，始終沒有瞭解。以上是說明日本部份人士研究中共問題的狀況及論壇風尚。今天來此出席研討會議的日本方面代表都是上述環境中苦鬥之士。如上所述，這些人士必須苦心努力，以強烈的意志才能通過貴國人士無意識中可以通過的難關。本人確信透過此次研討會，必能獲得極大的啓示。

最後敬祝擔負歷史使命於一身的諸位先生的奮鬥與勝利。

一九七二年國際局勢的展望

鄧公玄

——今天的世界是唇齒相依的世界，我們的前途當然與整個世局的演變有密切而不可分割的關係。但是 總統告訴我們，「立國之道，操之在我」，又說我們必須「莊敬自強，處變不驚，慎謀能斷」。因此，不管今年國際上有什麼變化，我們都必須把握我們自己努力之道。——

壹 一九七一年的回顧

去年（一九七一）是二次大戰後國際局勢變化最大的一年，也是美、蘇、匪三角關係進入最微妙的一年。在這一年中，國際風雲愈演愈烈，而其中最引人注意者，殆無過於尼克森在七月間宣佈將於今年親訪匪區，與八月間宣佈美國實施新財經措施兩端。由於前者，使自由世界反共陣線益趨崩潰；由於後者，則美國與其盟國發生空前的齟齬。更由前二者的交互影響，遂使美國在聯大所提雙重代表權案遭受失敗，而我中華民國不得不退出我所創始的聯合國。至於印、巴戰爭之爆發，中東戰禍之加深，也無疑的是由尼克森

「聯匪制俄」的政策所間接造成的。

有人說，一九七一年是尼克森個人表演的年代，因此他被選為一九七一年的風雲人物，原非無故。尼克森之所以能製造如許驚人的事件，也有人說，這是因為他得到一個「危險天才」的助手季辛吉而來，這當然有幾分道理。但是我却認為這是時勢所造成，並非季辛吉有什麼了不起的能耐。作者屢次指出，美國在戰後所採取的外交與國防政策，自始就注定是失敗的政策，蓋自杜魯門主義以來的「防堵政策」，祇是「門羅主義」的擴大，而「門羅主義」已不適用於二十世紀的時代。因為美國在十八世紀所產生的「門羅主義」，可以阻止當時的歐洲帝國主義，而實不足以防堵今日的共產帝國主義，昔時的帝國主義以土地與資源的侵略為主，而今日的共產帝國主義，則於